

## 四、保护权力的警察、检查、自卫队

### ——七十年代对策如此坚决实行

权力作为防止内乱的手段，要保持维持治安的机构。如果说内阁调查室、公安调查厅是侦探国民动向有权力的触角，那么警察、检察是阻止国民反抗统治的警棍，自卫队便是消灭反抗分子的绞刑架。

#### 1. 七十年代权力的耳、目、口

##### 先锋兼中樞的自民党治安集团

为了渡过一九七〇年代，以政府、自民党为中心的体制方面，通过收集情报、机械的强制机构、审判，一般宣传等，对经常的治安机构进行了稳步而踏实地整備。其中就连以收集情报、一般宣传，使左翼团体的解体为目的的内阁调查室、公安调查厅在予算、机构、人事方面都进行了空前的扩充。内阁调查室和公安调查厅在国民面前不能光明正大的存在而令人感到恐惧。

“一九七〇年代是我们自由主义者胜利呢？还是赤色分子排除我们建立独裁体制呢？这是个胜败关键的年代。内阁调查室、警察、自卫队虽然为一九七〇年代而加劲于，但他们内部隐藏着赤色分子。这就是说，我们成为一九七〇年代

的先锋，成为中枢机关指导他们的工作肯定是必要的。”

约定“不发表姓名”的一个自民党治安对策特别委员说了这样的话。他说的话既不是他自负也不是他夸夸其谈。自民党的治安集团真正是具备一九七〇年代的先锋和中枢的實力集团。

所谓自民党的治安集团是集中于该党的治安对策特别委员会（委员长相川胜六氏）、政调国防部会（部会长源田实氏）、安保调查会（会长赤城宗德氏）、基地对策特别委员会（委员长池田清志氏）等组织内人员的总称。这个治安集团的班底是被旧内务官僚、旧军人、自卫队、警察等出身者所占据，该党极右团体的素心会集团成员有两重性背景。

素心会的所谓素心的意思是“丢掉物欲和权力欲等邪念的朋友的集合体”，是一九六〇年的安保骚动当时标榜“排除国际共产主义”而结成的集团。这里的成员是聚集所谓自民党的老资格的右翼人物，在岸内阁时期是为该内阁出谋划策，为其思想的支柱，即使在今天，佐藤、福田主流派的素心会成员很多的情况下，甚至影响到佐藤内阁，使佐藤内阁只采取极端右翼的姿态。

这样，治安集团就等于素心会集团。他们在政府和自民党内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像上面所说的，他们同佐藤内阁密切结合，此外还有：①它是以战斗的姿态出现。②在右翼集团中具有无以匹敌的反应自民党的本质。③具有指导协助具体的行政权力的力量。关于其中第③条有必要加以若干说明。

自民党的治安集团掌握的自民党内各委员会，同社会党内的各委员会不同，它是以掌权的各行政官厅为背景的。治安对策特别委员会对警察厅、国防部会对防卫厅、安保调查

## 素心会的成员

- 佐藤派：增田甲子七、西村直己、植木庚子郎、竹下登、相川胜六、大野市郎、冈本茂、北泽直吉、大村襄治。
- 福田派：福田赳夫、永山忠则、森下国雄、千叶三郎、渡海元三郎、福永一臣、坊秀男、有田喜一、小川半次、斋藤宪三、盐川正十郎、田中龙夫。
- 前尾派：周东英雄、丹羽乔四郎、荒木万寿夫、佐佐木义武、龟山孝一、谷垣专一、正示尉次郎。
- 三木派：早川崇、森山钦司、谷川和穗、志贺健次郎。
- 川岛派：古屋享、冈崎英城。
- 石井派：长谷川峻、古川丈吉、大坪保雄、坂田道太、进藤一马。
- 藤山派：床次法二、池田清志。
- 船田派：船田中、川野芳满。
- 无派系：贺屋兴室。以及其他。

会对外务省、基地对策特别委员会对外务、防卫、警察等各省厅的预算以及法案的审查有绝对的权力，不经过自民党这些治安关系委员的认可，各省厅在事实上什么事情也干不成。因此，外务、警察、防卫各省厅的官僚，要根据自民党治安集团的意向有某种程度现实的变化，使与自己方便的法案在国会通过——只能是有这两者的结合。因而，自民党治安集团是一九七〇年代治安对策的先锋，而且具有掌握中枢的实力。

### 最大的心愿是治安立法

那么这个治安集团当前的行动目标是什么呢？第一是“确立强有力的治安立法”。一九六八年八月八日，自民党的安保调查会、治安对策特别委员会、国防部会、基地对策特别委员会在一起举行联合部会，进行紧急协商确立治安立法。属于治安立法范围涉及好多种，当前想到的有，自卫队的治安出动立法、保护秘密法、破坏活动防止法和刑法中的

骚乱罪的强化、国会周围游行规则法的法制化等。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午前零时十五分、警视厅决定对在新宿车站投石、放火的反日共系全学联的学生治以骚乱罪，在这个决定的背后是由于自民党治安集团的推动，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关于自卫队的治安出动法，与自民党治安集团召开联合部会的同一天也是在八月八日，由防卫厅长官增田在众议院内阁委员会上强调了该法律的必要性。明确了该法律正在研究之中。还有关于在国会周围游行规则，相川治安对策特别委员长干劲十足的说：“找机会使其在自民党的议员立法上通过”，向国会提出也只是个时间问题。

基地对策特别委员会以“七〇年代的问题既不是外交问题，也不是学生、工人的游行示威问题。而是造成日美关系磨擦的原因的在日美军基地问题。”从独立自主的立场出发谈基地对策问题。

更在一九六九年十月，治安集团的渡边一太郎氏（参议院议员，内务省1938年集团）在自民党行政调查会（会长木村元行政管理厅长官）的同意之下提出了关于改革警察制度的试行方案。这个试行方案把警察厅升格，使其独立，在将其长官列为国务相的同时，要把国家公安委员会变成该厅的附属机关。还要让首都警察（警视厅）和机动队由国家费用承担等，露骨的表现出警察行政的“自民党化”。对此甚至连警察官僚中也有人批判说：“在这里，警察法第二条的不偏不党、公正中立的宗旨也完全没有了。”

治安集团的第二着眼点是设置强大的防卫力量。一九六九年八月九日，当时的船田安保调查会长阐明了一百万人的民间防卫组织设想，这是自民党由治安集团国防思想的象征。这个民间防卫组织、为准备归还冲绳增强我国的防卫力

量，要组成一百万人的“民兵”，目的是提高国民的防卫思想和解决自卫队员的不足。对这个防卫设想连防卫厅的干部都说：“因为‘过于冒进了’不知如何评价好”。总之，自民党治安集团的国防思想、反共思想，是“激进”的这个问题，有关人民的看法似乎都是一致的。

自民党的宣传鼓动也积极活动起来。自民党一九六七年十月开始把党的机关报《自由民主》改为《自由新报》，发行间隔也从一九六八年六月改为周刊（在那以前是旬刊）。在这个《自由新报》里，每刊都有右翼评论家出现，用漫画攻击革新阵营。此外作为出版物还有：《组织广报》（旬刊）、各种《学习丛书》、该党的政治资金团体国民协会的《国民之声》（旬刊、发行十五万部）、《国民协会丛书》，各种活页文选等。还通过电波广播也很活跃。每周的二、四、六午前七点四十五分开始十五分钟以“自民党的时期”用日本短波广播，如日美安保固定化可以看成是“预备节目”，变换各种演出者，面向国民搞成党内讨论会。从一九六九年未开始，以酒吧间的女服务员为对象搞安保讲座，这也是自民党七十年代的对策的一环。

### 神秘的内阁调查室

自民党治安集团如能起到七十年代对策的先锋、中枢作用，则内阁调查室的作用则是政策方面七十年代对策的神经中枢，可被看成是其核心。虽然这么说，但内阁调查室有哪些机构和人员组成？搞哪些活动呢？国民是不知道其详细情况的。因此，在涉及内阁调查室七十年代对策之前，先探讨一下内阁调查室的机构和人员的组成。

内阁调查室是在一九五二年四月第三次吉田内阁当时，根据绪方副总理的强烈要求：“有关内阁的重要政策的情报

的收集和调查”为目的而创建的。当然是日本最初的情报机关。绪方副总理是战时情报文化局总裁，第一代室长把内调的主意兜售给吉田、绪方的是村井顺氏。据说当时的村井氏是国家警察本部警备部副部长，决不是因为他居“高位”，而出于天生本性的想法谈到：“像弱兔以长耳朵保护自己那样，没有军备，软弱的日本要以获得正确的情报来保护自己 是必要的。”内调创立当时他巧妙地占据了室长的交椅。现在是综合警备保障公司即保镖公司的总经理。

创立当时的予算只有五百万日元，虽然专务职员也不足十人的小组织，但吉田首相每星期二、五的定期会合日都出来会见，详详细细地听取报告。有时，担当官若很详细说明中国国内建设的情况，吉田首相便突然大喝一声说：“我不想知道河流怎么样，桥怎么样。我想知道中苏两国有什么样的矛盾？”吉田也许从这时开始已经估计到中苏两国像今天这样的不和。作为吉田氏想方设法要把这个内阁调查室培育成美国的中央情报局那样强有力的情报机关。

内阁调查室能不能与中央情报局相比姑且不论，而在今天，一年间有八亿日元的予算，培育成为拥有七十多名职员的大情报机关。以本部作为“公开”的建筑物是在东京都千代田区三年町五号的总理府大厦六楼。如果若向总理府一楼的收发小姐询问“内调”，她会笑眯眯地告诉你内调的所在。

内阁调查室里室长之下有次长，那里有六名主脑人物。室长主要是属于警察部门，次长是属于外务部门。现在的大津室长是内务省1940年集团成员，以前职务是警察厅的警务局长。还有都仓次长不用说是外务省出身。六个首脑人物分别兼任：一部（国内形势）、二部（海外形势）、三部（时

事宣传一般对策)、四部(资料收集分类)、五部(学识经验者对策)、六部(综合分析)的部长,这些主脑人物是从外务、通产、防卫、公安调查、警察各省厅出身者中调来的人物。这里警察出身者掌握内调的主导权,没有警察权的内阁调查室根据需要依赖警察进行调查,据说警察厅的公安二科对“注意人物”进行盯梢。

### 周密的“宣传要领案”

那么像这样的内阁调查室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的呢?在《大藏省职员录》写的说明中说内调是“收集和调查有关内阁的重要政策的情报”,究竟是干什么,一点也不清楚。

这里有趣的是文件。在《周刊读书人》一九六八年五月廿七日号上,刊登了由吉原公一郎阐明的内阁调的“启蒙宣传要领案”和“政府的民间广报细目”。这个文件是看了在一九五二年三月廿六日的治安关系恳谈会上决定的内阁调查室设置案的内容后加以阐明的。决定的时间虽然很早,这文件的“精神”即使在今天也是脉脉相传,必须引起注意。首先,“启蒙宣传要领案”为宣传提供消极的和积极的两个方策,分述如下。

#### 消极的方策:

一、关于国家治安上难以允许的有害的言论出版等,讲求最小限度的限制取缔方法。

二、不根据立法的权限是所谓消极的宣传工作。根据工作人员和工作费用,还根据对革命势力国民的抵抗意识,把宣传的影响只能停留在狭窄的范围内。如:①限制有害的宣传组织的资金范围。停止对大规模捐款的公司的融资。②在演剧的情况下为了竞争搞优秀廉价的节目,吸引观众。或者垄断入场券的工作(注意由财界主办的音乐鉴赏团体、音协的

活跃)。③予先得知市场贩卖“有害出版物”加以垄断收买。④对党（共产党）贴的非法的煽动性的传单，组织工作人员进行有组织的除掉。

积极的方策：

一、把一个题目从各个角度进行反复多次的处理，用标语式的简易化的美丽的语言渗透到人们的生活感情之中，使之形成国民感情、国民精神，能够防止动摇。

二、一个合作者不知其他合作者通过纽带把各合作者团结起来，必须由多数人齐心协力时需要调查官从中加以介绍。

积极的方案的内容好像似介绍纳粹德国紧张的宣传技术，对此希望给以注意。

下面看看“由于政府从中努力进行的民间广报细目”。在这里具体的指定了关系报道者的职务、报纸和杂志，具体方策像下列这样清楚。

一、报纸方面——同编辑首脑的恳谈会，每月一次。有副总理、官房长官和派在官邸采访的政治部长参加。

二、由外部合作人员准备原稿。向副总理、长官、副长官在定期会见时提供反共资料。

三、出版与综合月刊杂志《世界》相对抗的新杂志。比面向青少年的大众杂志《家之光》稍稍有些面向知识分子。

四、利用学者，利用学生对原有杂志进行投稿战术。

五、协力机构——日本自由人委员会、自由人俱乐部、产业协力联盟、外政学会、日本文科学会、国际文化协会、日华文化协会。

在前面的《文件》中关于其他杂志的收买方法等加以详细的说明。还在民间广报细目中，同有关报道界首脑以及派



在官邸采访的政治部长的恳谈会，直到今天还在相当积极的进行着。政府在最近把一般的广报活动从内调事务中分离出来，以总理府广报室为中心，用巨额的予算，从事政府的宣传活动，关于这个问题后面还要谈到。

### 成为走卒的外围团体

然而，这个内调的存在在社会上引人注目的时机是“内河事件”。所谓内河事件是化装成商社人员到苏联旅行的内河吕富氏，以间谍嫌疑于一九六六年十月被苏联官宪逮捕的事件（当时是三十一岁，苏联当局于一九六七年六月发表）。内河氏是内调的外围团体——世界政经调查会的职员，在苏联进行“间谍旅行”期间被捕了。苏联予先知道内河氏是间谍，让他在苏联国内到处钻营，等他到达适当的地方加以逮捕的。

可是，以这个事件为契机，内调的特务活动和帮助其活动的外围团体的存在都公开了。

虽然说内调比当初机构扩大了，但归根结底七十余人的职员进行全面地调查活动是不可能的。因此，内调把世界政经调查会为首作为外围团体给了大量的金钱，有效的利用了那些团体的特性让其搞调查。向社会公诸于世的外围团体像另外的表中记载的那样，此外像内河事件的世界政经调查会为首的“秘密”团体是相当多的。

世界政经调查会会长广冈谦二是警察官僚出身。该调查会里的宫子实（陆军士官学校三十六期）、白鸟一郎（陆军士官学校四十二期）、大屋角造（陆军士官学校四十三期）各氏均为旧军人出身，其取材的方法同旧军内谍报使用同样的手法。

国际形势研究会的规模作为外围团体是最大的！该研究

### 内阁调查室的外围团体

名 称	研究调查内容
海外事情调查所	海外资料特别是非洲、拉丁美洲的事情调查
内外事情研究会	以中国为首的近邻各国有关社会经济文化的调查
东南亚调查会	亚洲和中东各国的基本综合调查
国际问题研究会	欧洲、中近东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事情的研究。
国际经济调查会	国际经济的调查和对日本影响的调查研究
亚洲动态研究所	在亚洲的各种出版物的翻译、中共形势的调查
民主主义研究所	民主主义思想本质的研究。
国民出版协会	宣传方面各种论调的收集调查
国际形势研究所	内外形势的调查分析判断，综合性研究
日本新闻中心	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收集、调查和研究
日本广播协会	海外广播的收听
内外形势调查会	收听资料的翻译、整理
广播新闻	收听共产圈、亚非各国的广播。

会分为国内班、中共和苏联班、东南亚班、综合班等，由审议委员十人，参与五十六人、研究员十五人构成。审议委员平泽和重（日本广播协会解说委员）、大来佐武郎（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佐伯喜一（野村综合研究所所长）、大野胜巳（原驻英大使）、林健太郎（东大教授）、大平善悟（原一桥大学教授）等各氏都是“有名人物”。该研究会每周召开一次审议会，内调室长也以观察员身分参加。研究会的题目按时事动态，提出诸如“中共的文化大革命”“捷克的形势分析”“在东南亚的美苏关系”“日本的中立”等问题。

五十六个参与当中有石川忠雄（庆应大学教授）、大川次郎（原内阁调查官）等各氏，在研究员中有久住忠男、广濑一、桑原寿二、藤井彰治等苏联问题研究家、军事研究家、评论家等连名并列。有趣的是这些外围团体按其目的分

类，例如，世界政经调查会、国际形势研究会等分别被统辖于内阁调查室的第二部（海外形势）、第六部（综合分析）。

内调第五部主要是对有学识经验者进行工作。五部的调查员到大学的研究室访问有目标的教授，例如“您不能写一篇关于东欧问题的调查报告吗？稿费按每页五千日元付报酬”。这样以来，教授们写的调查报告经过内调的外围团体“民主主义研究会”给以印刷，每年有七、八十种出版。一九六七年内发表了《中共威胁日本吗？》的调查报告。这是京都大学法学部教授、助教授五个人一起为内调写出的“委托撰写原稿”。

二、三年前的内调，不管怎么说都是依赖于右倾的教授们写的稿子，但最近也依赖于中立乃至左倾教授们写的原稿，通过这些文章活动来促使他们的“转向”。因此，当初收集资料的目的，是逐渐地向破坏左翼思想体系的目的转化。内阁这样极端露骨的引诱学术界，在一九六七年九月的《朝日新闻》上受到大家的批判。

### 活跃的报导活动

前面虽然说明了内调的《启蒙宣传要领案》《政府的民间宣传报导细目》，但最近政府把一般的宣传报导活动机能从内调中分离出来，以总理府报导室为中心，以巨额的予算，大规模的展开政府的宣传活动。

编制一九六八年度予算虽然是在财政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但政府宣传报导方面的予算总额达到十二亿一千九百万日元之多，比前一年度九亿三千六百万日元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一九六九年度更长增到十三亿三千三百万日元，一九七〇年要达到十三亿零一千万日元，增长一倍以上。予算要求的细目是：广播费十三亿五千万日元、出版费十亿三千万日

元、电影摄制费三亿八千万日元、舆论调查费等一亿八千万日元。

以这样膨胀的预算为背景，通过文化广播的“采访笔记”节目（十五分钟左右，三十八个局的联播网）、日本电视台“想听那个台”、东京电视台的“日本广场”富士电视台的“夫人采访备忘录”、（以上都是十五分钟）、日本短波广播“生活传话筒”等，用电波送进家庭。此外“日本动态”“政府之窗”“照片”等出版物也对地方公共团体，公立学校等免费赠送。

一九六八年十月八日创刊的周刊报纸《今周的日本》也必然涉及若干。内阁宣传报导室把编辑工作委托给“今周的日本株式会社”，这个报纸单独搞了政府的宣传活动，这个报纸同一般报纸同样大版面共十六页。其中半数由政府宣传报导资料，另外一半是处理匿名时评、经济读物，驻外公馆报导，采访报道等。一分定价四十日元、发行三十万分，除分送各订户外，在车站报亭出售。

可是，内调要搞什么样的七十年代对策呢？某记者到内阁官房会计科采访内调一九七〇年度预算要求概要。于是会计科不友好的回答说：“关于内调的事情请到内调去问吧！”因此，该记者又到内调的预算担当者那里去打听，回答是“你去官房会计科去打听吧！”内阁总理大臣官房会计科一九六九年八月发行的“有关官房预算要求的概要”，即便看了这个小册子，也看不到内调的预算。内调的预算隐蔽到这种程度了。内调当局极为谨慎的说：“其中七十年代的对策费没有多少啊！只是因为整理资料的人不足，一九七〇年才有所补充”。读者之中无论是谁也好，试图想采访内调预算也好，这边先对来访者发出一连串的询问：“你的职业，姓

名，采访的目的”，然后又拒绝地说：“很对不起，这种事情我们没有发表的权利，请原谅！在采访内调中必须有“特殊技术”。总之，人们摸不着从头到尾的全貌，只好留心注意。

### 阴森可怖的公安调查厅

千代田区九段南一丁目一番地十五号即公安调查厅。在有数的官公厅建筑物中，如此阴森可怖的建筑物是没有的。白天，你一踏进这座建筑物，便从守卫那里发出质问：“你是哪一位？”守卫的门斗特意设在正面台阶的旁边，不管谁和谁从那里出入都要盘问。像普通的官厅那样自由的会见是不可能的。在像接待室一样的地方等待，要等对方到接待室来会见，这已成为制度了。

夜里没有像公安调查厅这样令人恐怖的地方。从靖国神社、九段会馆（旧军人会馆）的旁边通过，走到面向皇宫的正面台阶上，眼前的台阶因有夜光涂料闪闪发光。在这个曾经是宪兵队本部的建筑物里，现在也是着长靴和宪兵臂章的宪兵队员出入，从厅舍的深处好像传出受拷问的士兵发出的悲鸣。

“然而，只有这座阴森的建筑物才能抑制日本的赤化。”  
（某公安调查厅干部说）。

公安调查厅是一九五二年制定了破坏活动防止法的产物。如果说一九五二年在皇宫前广场上出现了“血腥的五一劳动节”的时期，那么当时吉田首相是以“制止极左、极右集团的破坏行为，确保公共安全”的名义而制定了破防法。尽管这么说，破防法表明公安调查厅的主要敌人是左翼团体，这是不言而喻的。

公安调查厅的第一代长官是审判员出身的藤井五一郎

氏。其次是齐藤三郎、吉河贞光、吉桥敏雄各氏。

公安调查厅是法务省的外局，在本厅的四百三十六人之下有关东、近畿、中部、中国、四国、九州、北海道、东北的公安调查局，除了东京、大板、神户、广岛等大都市外在四十二个地区有地方公安调查局。定员人数一千九百九十六人。

该厅的中心不用说是在东京九段的本厅。该厅内有一部、二部、总务部等共三部，第一部内第一科（分管日共）、二科（分管机关报纸）、三科（分管劳动）、四科（分管学生团体），以掌握国内左翼团体的动向为中心。第二部里第一科分管朝鲜总连，二科以苏联、中国为对象，三科分管右翼。在总务部内除总务科、职务科、资料科之外，还有心理科，还的确有点像公安官厅的样子。

公安调查厅最活跃的是在一九六六年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格里申应总评的邀请访日的时候。偶尔碰到苏渔业部长伊希科夫来日访问，日本的宣传机关都围着“大臣转。然而，公安调查厅对伊希科夫毫不注意，而对格里申盯住不放。诚然伊希科夫在部长之中相同的地位在苏联国内有二百个。而另一方面格里申在苏联是第十三号地位的重要人物。这样，在格里申归国后，使苏联同日本的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公安调查厅的一个服务官得意洋洋的说：“那时警察厅无视格里申的重要性，因此未能预料到同日共的和解。与其相反的是我们……”。涉外的公安调查厅第二部、警察厅警备科、公安二科之间争功名也是很厉害的，有时也在一起搞。

### 坚决实行七十年代的人事

可是，像这样的公安调查厅在一九六八年九月使吉河长

官、长谷次官退位，诞生了吉桥长官、内田次官的新人事安排，当时是由赤间法务大臣亲自断然实行的。这就是一般所说的公安调查厅七十年代人事。

吉河前长官被左翼看成是“反动权威”式的人物，从一九六四年五月就任长官以来，对社会、工人、学生运动采取严厉的态度，屡屡同赤间法相闹对立。其一例是反代代木系全学联的对策。一九六八年三月是不是把最初的破防法适用于全学联成了问题的时候，强烈主张“适用”的是吉河、长谷两氏。镇压全学联的运动对赤间法相来说决不是反对的，但吉河氏的作法“敌汽心膨胀”，反而失策。吉河氏过于“正直”而陷于窘境。因此，赤间法要求吉河长官、长谷次官的“鹰派联合”退位，使吉河氏就任了按规定年令退職的齐藤之郎的广岛高等检察院检察长的职位。不过，是法务大臣谘询机关的法制审议会的刑事法特别部会（部会长是小野清一郎）于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六日的全体会议上决定了创设骚乱予备罪，像这样的决定是接受了赤间法务大臣的意图，这是不难想像的。

继吉河之后的吉桥敏雄氏，原来职务是广岛地方检察院的检察长。没有理由说继鹰派之后的吉桥氏是鸽派。吉桥氏东大毕业后，作为广岛地区法院的检察官而发迹。从一九四八年为公安调查厅前身的特审局总务科长兼调查科长为止，游动于东京、冈山、东京的检察领域之中。一九五二年与公安调查厅创立的同时成为该厅第一部代理部长，在一九六〇年的安保骚动中以关东公安调查局长的职立施展才能。是比吉河前长官更老的检察官资格，面对于一九七〇年以及七十年代的对策，一九五二年七月在追究日共地下干部最激烈时期，因有人向自己住宅中投掷火焰瓶，其反共意识比别人强一

倍。次长内田达夫氏的原职是岛取县地方检察院的检察长，与公安调查厅没有直接的联系。可是作为公安检察官是老手，从一九五一年担任中央经济调查厅法务科长开始，对经济官厅早就有所体验。

可是，在一九六八年与公安调查厅的大变动的同时，也必然要涉及东京地区检察院的人事变动。那就是以追究贪污、政治贪污案件而活跃起来的东京地区检察院副检察官河井信太郎成了最高检察官，同时替换了高桥正八最高检察院检察官。诚然，如果说最高检察院检察官，“显要地位”虽然不错了，但归根到底，只是名誉职务的闲职而已。这件事情连河井本身也这样认为。诚然，在武州铁道事件、假证明事件、平冈事件、都议会贪污、吹原·森胁事件、田中彰治事件、共和制糖事件、日通事件等都是河井氏亲手处理的。河井虽是有经验的老手检察官，但是到了七十年代不需要老手的贪污检察了。如说东京地区检察院的副检察官代表检察工作，那么在事实上是掌握了七十年代检察工作的人，而历任内阁调查室调查官、东京地检公安部长等职的高桥氏对于政府来说，则是“必要的人物”。还有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就任了第四代公安审查委员长（审查有关运用破防法的公安调查厅的请求书）的律师界“死硬派”大山菊治氏也值得人们注意。连本人也常常劲头十足地说得令人恐怖：这回我的事业也许是非常必要的”。

对于一九七〇年以及七十年代一连串的人事变动，具有进行总结意义的是于一九六九年九月津田法务次官的上台。津田氏在战前虽然搞了十年审判官，然后成了检察官，干过法务省刑事局长、最高检察院刑事部长、札幌高节检察院检察长。他曾经作为秘书科长服务于五代大臣并熟知“政治内



幕”。他在一九六九年九月向母校京都大学引进警官队的时候拉开架子说：“现在的学生的暴力是不能容忍的”。其“思想”也得到了佐藤首相的喜欢。

### 大幅度的增加公安调查官

那么法务省及其外局的公安调查厅如何考虑一九七〇年、七十年代的对策呢？

在一九六九年度的预算要求中法务省以“一九七〇年对策”为支柱，使社会感到“唉呀”一声。因为要求的方法过于“正直”、明确了从一九七〇年度乃至七十年代采取对策的姿态。

根据法务省一九七〇年度预算要求可以看出，要求总额为二千零二十亿七千五百万日元，比前一年增加了一百九十八亿一千八百万日元（增长百分之二十四点一）。首先是作为公安调查厅的调查破坏活动以及情报收集费要求了三十九亿四千三百万日元。比前一年度增加六亿日元。在这里，是以公安调查官员的增加和调查活动的充实为基轴搞起来的。这样被公安调查厅调查、跟踪的，被警察抓住的人，在大量增加检察官之下需要进行调查。总之对嫌疑者的调查需要增加检察官四十八人、副检察官九十五人、检察事务官二百一十四人，根据增加官员的人数提出了一九七〇年度的预算要求。

在被捕者的收容设施方面，只与公安事件有关的设想在七十年代约有四万三千人，这是起码的“估计”，这一方面要计划整备、扩充各拘留所、监狱。另一方面也要考虑监狱的“自卫对策”。监狱内防止骚乱，除从前防止骚动用的盔形帽外，要准备防护衣，防护手套，磁带录像机、磁带录音机、照像机，机动队要全付武装。把绝食斗争的学生放在床上注入流动食物、营养食物用的床也要购入一百张。这样看

来更应该说是“无微不至的七十年代对策”。

就在法务省着手搞一九七〇年度予算要求的时候，“平贺事件”“饭守事件”相继发生了。平贺事件是一九六九年九月，札幌地方法院的平贺院长以后辈身分致函亲手处理长治诉讼案(围绕奈克导弹基地建设的自卫队的违宪诉讼案)的福岛审判长，信中说对自卫队要以合乎宪法的审判。这封信作为侵犯审判的独立而受到严厉批判，最高法院也不得不给平贺氏以处分(转至东京最高法院审判员)，而批判这种“处分平贺”成了问题的是“饭守事件”。同年十月，鹿儿岛地方法院的饭守院长，在也有问题的自民党政治资金团体财团法人国民协会十月一日发行的机关报《国民协会》上发表了“‘处分平贺’是不应该的”见解。当然，在饭守的发言中发出了比平贺信中更强烈的批判，但自民党治安集团与此相反，提出了更强烈的相反批判说：“像福岛审判长属于青年法律协会的‘左翼团体’里的审判官更成问题”。这是不打自招的表白。自民党治安集团的这种态度说明了自民党治安集团——法院——法务省——公安调查厅各方面一连串的检察、审判机构和自民党之间的关系，结果起到了把这种关系暴露于天下的作用。

## 2. 这就是检察、警察

### 政治倾向强烈地检察机关

在前一节中谈到监视国民的耳目应该说是内阁调查室、公安调查厅，而谈到握有权力的“口”应该以内阁报导室为中心加以叙述。因此，在下面进一步把阻止国民反抗的检察和警察合起来加以说明。

一九六八年参议院选举揭晓约四十天以前的六月五日，社会党内参议院议员大仓精一氏突然被东京地方检察院逮捕了。怀疑该人作为日通的参与受贿二百万日元，要求同僚议员柴谷要氏（前社会党参议员，劳动福利事业团监事）在国会上要酌情追究日通事件。在黄金压延板的分配、伊豆的日通富士见土地的不光明的经营、日通总公司的漏税、米谷运输的垄断等纠缠日通的一连串事件，作为战后少见的贪污案件，受到了舆论的强烈批判，东京地方检察院动员了近九十人的检察官、事务官处理该案件，大仓氏也同那个日通事件作为“嫌疑者”受到检察当局追究责任，结果他本身没有任何问题。

可是，从日通事件整体来看大仓逮捕事件，大仓的逮捕只能是高深莫测的日通事件的“深层底流”以外的事情。

原因是掌握日通事件关键的是前总经理福岛、前副总经理西村、前财务管理科长田村等，以及与他们有联系的得到了好处的是为数很多的自民党运输系议员。即在日通事件中首先应逮捕有重大嫌疑者，在自民党中到处都是。

那么，检察当局为什么逮捕大仓氏呢？其理由不能离开政治来考虑。在一九六八年参议院选举中传说居劣势的自民党同检察当局“有密秘”勾结，除了为打击社会党以外，便找不出“逮捕大仓”的确切根据。

可是自民党福田干事长派议员、以“权威发言人”自居的池田正之辅议员也于一九六八年六月廿四日，突然因日通事件受到东京地方检察院的调查，于廿五日被起诉。担任众议院予算委员会理事的池田通过杂志《政界吉普》的久保俊广从日通领钱，还对在野党方面作了不要追究日通事件的工作。

在调查池田之际，当时的福田干事长强烈反对，为此还通过赤间法相向检察当局施加压力。规模虽小，但却是一种指挥权力的发动。关于这个事件，检察厅对自民党的议员也能进行公平的调查，有人说：“还是检察当局是“正义”的官厅”。然而这是一种轻率的判断。

由于福田干事长作了工作，不逮捕池田，在池田家调查，比社会党的大仓氏采取了缓和的措施是众所周知的。尽管池田氏是福田干事长的智囊，但对该福田干事长来说是绝对不欢迎的，更何况对佐藤首相来说，池田氏的起诉不直接给予回答。勿宁说“池田调查事件”同大仓氏同样、与日通事件并无本质“联系”，而是与国会对策，特别是与社会党的关系而产生的事件，对此必须加以注意。对池田氏的调查和起诉是为了对于社会党的追究制造辅助根据，这个用处是不应忘记的。归根到底，现在的检察机关是作为佐藤内阁的一定的权力机关的事实，这是个应该引起注意的目标。像我国的检察机关这样强的“政治倾向”是没有的。

### 主流是思想检察官

那么检察当局的“政治倾向”是从何而来的呢？回答是由检察当局的“传统”而产生的呢？

我国检察当局的“主流”是思想检察官。“强盗和小偷虽然不能亡国，但思想犯的知能、思想、行动可能败坏国家的根基”——这种思想古今不变的扎根于检察官的头脑之中。当然，过去的检察官考虑的是天皇制国家，今天检察官考虑的是资本主义制国家，只有这个区别，这样，思想检察官经常是在公开的协会活动，而刑事领域的检察官往往必然是在背后暗地里活动。

当然，在思想检察官之中也分成积极拥护体制派、消极

拥护体制派，更有学阀和妻党之别，不得不分成若干个派阀。而且，他们作为同“体制”密切结合的思想检察官，利用政治家，着想于自己的出身立世，进行派阀之争，这样形成检察当局与政治家之间难以分离的关系。

例如，战前的思想检察官，有属于盐野季彦法相的盐野派和属于小笠原直法相的小笠原派之分，互相争夺领导权，其激烈的“斗争”据说也传进现在天皇的耳内。

总之，战前的检察官的权力是强大的。战前的政治贪污案件——帝人事件中，当时的审判长藤井给予全体被告以无罪判决，因此触怒了检察当局，被流放到外地去了，因此，政治家参与检察当局的派阀之争也是十分有“价值”的。

#### 因造船贪污案收复失地

战后受到民主化攻势煽动的思想检察官，完全失去了往年的势头，就连刑事领域的检察官也有点“春天”的气息。战后检察当局的工作在揭发黑暗，追究暴力、盗窃等刑事方面是其重大责任。

可是刑事领域检察官时代持续不长。以一九四八年胎和电工贪污案为契机，其后相继发生的政治贪污案，没有把思想检察官放在很低的位置上。特别是围绕在新刑事诉讼法下发生的一九五四年造船贪污条案检察当局的动向，其后确实是，检察官僚们迅速地接近政治。

造船贪污案当时的总检察长佐藤藤佐、东京地方检察厅检察长马场义续(前检察总长)、东京地方检察厅特别搜查部长山本清二郎(后为最高检察厅刑事部长)，主任检察官河井信太郎(后为东京地方检察厅副检察官)等各位检察成员都认为：“掌握造船贪污案件关键的是自民党干事长佐藤荣作，该党政调会长池田勇人二人，特别是逮捕佐藤是非常必要的”。

当时最高检察厅次长岸本义广氏（后为自民党议员）在表面上也支持佐藤总检察长的方针。对此，法务省事务当局开始的态度是不明朗的。

后来当了总检察长的清原法务次官、井本刑事局长（后为总检察长）等于一九五四年四月向犬养法相提出紧急报告说：“根据检察法第十四条，法务相有权对检察当局进行综合指挥监督。”由于动用了那个臭名昭著的法相指挥权，事前确认了检察当局对国会的逮捕申请。这时岸本氏同吉田首相偷偷地联系，促使动用指挥权。如果这是事实的话，岸本氏则巧妙地起到了“平衡泵”的作用。

当时，岸本氏围绕总检察长的职位，同清原、马场氏等进行了激烈地斗争，岸本氏为了取得吉田首相的好感，说不定在背地里进行了策划。总之岸本氏是检察厅闻名的“政治家”，当时以让位于佐藤藤佐总检察长的后继者花井氏为代价，约定一年后花井氏把总长的位置让给岸本氏（松本清张著《现代官僚论》），可是花井氏冲破了同岸本氏的密约，指名清原氏为总检察长，清原氏更指名马场氏为总检察长。

就这样，一心希望当总长的岸本氏于一九六〇年同昭和电工贪污案在得到了“关照”的已故大野伴睦氏的帮助下，当选为议员。可是当选的喜悦也只有一瞬间。岸本氏以违反选举被马场总长指挥的检察阵营方面彻底追究，“‘正义’的检察官落魄的下场”成为众所周知的话题。

### 为派系服务的检察官僚

俗语说“检察是佐藤派”，就像故河野一郎氏曾经对警察具有强大影响力一样，佐藤首相以造船贪污案为契机对检察厅产生了影响力。特别是佐藤政权的基础从一九六六年确立时开始思想检察官“活跃”的情况实在是惊人的。

一九六六年夏天的各日报的社会版报导吹原事件和田中彰治事件颇为热闹。吹原事件当初，围绕经纪掮客的吹原弘宣，好像是欺骗事件，随着“黑金字据”的明朗化，带上了政治贪污案的色彩。所谓黑金字据传说是池田内阁当时的黑金官房长官交给吹原的字据，因此池田派获得了大量的政治资金。

看到了这种吹原事件发展的情况的政界专家们认为，不能只把这个事件看成是刑事案件，应看成是政治案件。原因是根据黑金字据尽管是不能追究政界人士的刑事责任，若从政治上来看，由于这个字据，原来具有能同佐藤派相抗衡势力的旧池田派（前尾派）的实力则会急剧的衰落。

旧河野派的田中彰治被捕事件同继其之后的共和制糖事件也不是没有关系的。所谓共和制糖事件虽是农林中央金库对共和制糖集团搞了不正当贷款问题表面化的事件，但因这个事件，在农林省有实力的旧河野派议员以及与旧河野派有牵连的农林官僚的责任均被彻底追究。而且，这时也同一九六八年六月的大仓被捕一样，社会党的参议院议员相泽重明因受贿嫌疑被起诉。

顺便谈谈当时的总检察长马场义续、东京高等检察厅检井本台吉等各氏。马场氏与佐藤首相、川岛副总裁关系密切，检察长据说我国有关检察行政的重要事项，全部都进入这些政府、自民党最高首脑的耳内，在今天佐藤首相——井本总检察长有瓜葛云云，考虑到像上述那样政治同检察的勾结，不是没有原因的。

### 被驱逐了的党人派

接着在一九六七年夏天围绕出租汽车冷气设备使用费的计算问题，发生了大阪出租汽车贪污案件，石井派的议员关谷

胜利（当时的众议院内阁委员长）被捕了。在大阪出租汽车贪污案件中，虽说有三十人的国会议员被列进嫌疑者名单，但到一九六九年十月，只有原健三郎、原因宪、德安实藏等各氏在报纸上出现了，其他人都不了了之，也有传说政府、自民党首脑害怕了，因为追究的手甚至伸到了佐藤派力量强的运输省。

这时的检察当局的态度也不明朗，虽然事件的直接负责人，大阪地方检察厅的天野检察长，别所特搜部长等人表示彻底追究出租汽车贪污案的姿态，竹内法务次官、井本总检察长等则表示很不感兴趣，因而有“正义优先的大阪、政治优先的东京”之说。顺便说一下，当时，代表“正义”，顽强的天野检察长被易职到高松高等检察厅检察长。

到了一九六八年，围绕第三次防卫力量整備五年计划发生了防卫厅的泄露机密事件。一九六八年三月，航空自卫队的空军一等校官川崎向伊藤忠商事公司泄漏了三次防的机密；以此嫌疑被逮捕，接着发展到川崎的上司山口空军将补（空军幕僚防卫部长）自杀的事态。这时，增田防卫厅长官（佐藤·福田派）公然宣称：“这时，把河野派的余党彻底扫除”。

试想，如果伊藤忠商事公司是故河野一郎氏的重要的出资者，那么伊藤忠通过有河野影响的防卫厅内局和军官集团向防卫厅出售武器。不过佐藤派却要节制对这个事件的彻底追究。原因是如果深究该事件的话，旧河野派、前尾派、三木派等要进行拼命的疯狂的抵抗，上林山、松野、增田持续了三代的佐藤派防卫厅长官围绕奈克、隼式（都是地对空导弹）、基地防空地面警戒系统（自动防空警戒管制组织）引起的“黑雾”很有可能被揭发出来。



这样，围绕防卫厅的黑雾仍然无法明瞭，这个事件也就完结了。日通事件也是自民党的党人派受到威胁，用逮捕大仓氏这件事来掩盖黑雾的真相。

当然，在追查一连串的政治事件之际，东京地方检察厅的青年检察官们批判了检察厅干部的政治性行为，要求贯彻“正义”。可是，青年检察官也不能把自己的地位置于险境去坚持正义。原因是这些青年检察官不能忘记东京地方检察厅的检察官安倍治夫曾经因为重审称之为“昭和山洞王”的吉田石松翁又宣布无罪释放一事，在《中央公论》《法律时报》杂志上发表文章，批评检察厅首脑部的无能，因此被放逐到北海道函馆的地方检察厅事件。若问是要“正义”呢？还是要“东京地方检察厅检察官的地位呢？”固守“有名誉”的东京地方检察厅检察官的职位，是这些青年检察官可悲的本性。

#### **警察的主流也是警备和公安**

警察也有两个流派。一个流派是取缔游行示威和思想犯的警备、公安集团；另一个是抓捕强盗、偷盗的刑事集团。这两个集团经常因为主导权问题进行激烈地对立抗争，但最终取得“胜利”的肯定是警备、公安集团。原因是刑事集团经常是孤立无援的，而警备、公安集团中有时掌权的是政治家。

直到现在统治我国的历代保守党干部懂得：“小偷和强盗是不可能动摇权力机构的，然而尽管是小规模的学生游行示威也会成为动摇保守政治家存在基础的“种子”，因而保护培育了警备、公安集团。如果说战前、战中的警察，那就意味着警备、公安警察等于思想警察，等于特高警察，他们的权力是极大的。

不过，这些警备、公安集团也有失意的时期。那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刚战败之后的十月四日之后联合国军总司令部命令解散特高警察的时期。联合国军总司令部的指令说：“废除治安维持法等镇压法律，在取消一切秘密警察、内务省警保局、保护监察局的同时，罢免内务大臣以下特高警察有关系者，必须实现释放政治犯人”。这个指令等于宣判了警备、公安集团的死刑。他们当中有的人靠熟人在町的工厂是做工，自己寻找守卫工厂大门的职业，除了为确保生存以外，没有办法。他们之中最幸运的集团是被放逐到厚生省，以致今天在统治着该省。

联合国军总司令部虽然驱逐了警备、公安集团，但这次联合国军总司令部的一部分人认为警备、公安集团是必要的。如众所周知，联合国军总司令部中像马卡特少将、凯迪斯上校等那样掌握民政局，“进步派与像威罗毕少将等以参谋第二部为靠山的“保守·公安派”相对立，其中公安派利用日本的警察监视进步派的行动。对这一类的事情，《西尾末广的政治备意录》（每日新闻出版）说：“从这开始了参谋第二部对进步派的反击，其目标是瞄准了进步派的凯迪斯上校，细细地调查了凯迪斯的身边情况。进行调查的是以警视厅刑事部长藤田次郎为中心的警视厅搜查科的成员。”

就这样，新的警备、公安集团重新由联合国军总司令部内的一派逐渐地被培养起来了。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新警察法颁布了，围绕新的国家警察长官的人选，斋藤昇（内务省一九二七年任用）、久山秀雄（内务省一九二八年任用）、林敬三（内务省一九二九年任用）三氏虽进行了激烈地争夺，结果还是由内务次官的斋藤昇氏（后来是自民党参议员、厚生相）就任了第一代长官。这时，据说这时推荐了参谋第二

部中成了调查进步派凯迪斯出身历史最高责任者的久山内务省调查局长就任长官。已经开始了向政治警察的介入。

### 统治警察的官房长官

一九四八年十月，第二次吉田内阁成立之际，官房长官由警察官僚出身的增田甲子七氏（后任自由党干事长、防卫厅长官）就任了。增田氏对警察当局的控制力量超乎想像，当时，町村金五（原警视总监）、冈崎英城（原特高部长）、大久保留次郎（原刑事部长）、丸山鹤吉（原警视总监）等各氏均被增田氏牢固地统治着。

松川事件、下山事件等一连串不可思议的事件都是在增田官房长官时期发生的事件，与松川事件发生的同时，增田说：“那是共产党一伙人干的事”。说出此话的增田长官高明的“手腕”，至今仍成为话题。当时在现场担任调查的福岛县警察队长新井裕氏，后来出任警察厅长官。一九四九年罢免斋藤国家警察长官事件也是不明朗的。增田长官当时以“社会党内阁以来的斋藤国警长官任期过长”为理由撤了斋藤长官的职。这可以说是斋藤长官不遵从增田长官的意图是不行的。

一九五二年由于对日和约的生效，在警察厅里新设了警备局，警察厅的警备、公安集团的权限逐渐扩大起来了。

可是，今天的警察，由哪些人来掌握呢？

概括起来说，是由“公安警察官”来掌握的。那么我们就看看这些公安警察们的侧面。

警察厅长官后藤田氏生于一九一四年八月，一九三八年高等文官行政科考试合格，一九三九年东京大学法律系政治科毕业的同时进入内务省。一九四〇年一月任富山县劳政科长，一九四六年以会计大尉衔复员，经过神奈川县商政科长

任警视厅经济二科长（后来的防犯科经济股）又返回老巢的警察机关，其后任国警东京管区刑事部长，一九五〇年任警察予备队本部警备科长兼调查科长（后来的防卫厅防卫局防卫一、二科长），一九五二年八月任警察厅巡逻交通科长，一九五五年七月任警察厅会计科长，一九五九年任自治厅官房长，一九六二年任警察厅官房长，警备局长，警务局长，警察厅次长，一帆风顺地晋升，一九六九年八月，继新井裕长官之后“担当七十年代长官”。后藤田氏在厅内是知名的快手，对七十年代前半期要彻底的推进安保、学生、劳动事件的对策吧！特别是后藤田长官“新官上任”的一九七〇年度的予算中，像后面叙述那样，很快就在编制予算中带上了治安警察的浓厚色彩。

根据后藤田长官所确定的方针负责东京治安者，不说谁也都知道的是秦野章警视总监。一九一一年十月生的秦野章氏是日本大学出身，天生的判断力和观念使他登上了警视总监的职位。表明他的战斗精神的是神户暗杀于急袭事件。大战刚结束的神户走私黑市和暴力的猖獗，使用手枪杀人的事件也频繁发生。当时是兵库县警察本部搜查科长的秦野氏怀中暗揣手枪，身着工作服指挥着刑事活动，总结那些经验，公开搜查凶恶犯人，拿出夜间交通警戒的白色摩托队等很多新着数。可是，与七十年安保的同时，天生的观念和判断力转向了治安警察方面，对学生使用机动队的暴力取缔方式逐渐进行升级镇压。

掌握七十年代治安的三杰是前面提到的后藤田、秦野两氏和川岛广守氏（警察厅警备局长）。川岛氏生于一九二二年，一九四二年中央大学毕业。同秦野警视总监一样都是私立大学毕业。进入内务省以后，立即属于宫城县。一九四七

年从马尼拉复原回来，一九四八年任札幌管区警备科长，一九五一年任国警警备科长助理，一九五五年任警察厅参事官及东北管区公安部长，从一九五七年被外务省派往南斯拉夫大使馆任一等秘书。在此期间，该人拿手的语言才能得到了发挥，到处收集共产主义国家范围内的情报。为此，在回国后就任了警察厅警备局外事科长，一九六三年任警视厅公安部长，一九六七年作为安保对策干部进两级而成为警察厅警备局长。七十年代的某一天，可能成为警察厅长官。

在这治安三杰之下，有山本镇彦警视厅公安部长、富田朝彦警察厅官房长、后藤信义警察厅警备局参事官、下稻叶耕吉警视厅警备部长等，对“反体制方面”的动向严加监视。

山本氏生于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一九四三年东北大学毕业。历任福井县农务科长、山形县警务科长、东京·本富士暑长、警视厅少年二科长、驻法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回国后任栃木县警察本部长，一九六五年成为警察厅公安一科长，一九六七年三月就任现职。作为警察官的“天资”是第一流的。

富田氏生于一九二〇年七月，东大毕业后，当了青森县人事科长，一九五五年任大分县警察本部长，九州管区公安部长，从一九六七年人事科长开始直到就任现职。

后藤氏生于一九一九年三月，从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八年在在外务省、厚生省任事务官，一九五六年任警视厅公安一科长，一九六七年就任警视厅警备部长。

下稻叶氏生于一九二六年四月。一九六〇年安保的时候是警视厅公安一科长，从一九六七年开始担任了一年的佐藤首相秘书官，窥视了佐藤政权的内幕，回到警视厅后也同首

相周围的人继续接触，成了佐藤政权身边的“跑腿儿”。一九六七年东京地方法院的山本审判长要承认在国会周围的游行示威时，向佐藤首相进言提出行政诉讼法异议、禁止游行示威的祸首正是当时的“下稻叶秘书官”。佐藤首相的宽子夫人于一九二八年访问机动队探望因学生游行示威而受伤的机动队员也是下稻叶氏出的主意。

以上列举的警察干部，都不仅是“治安优秀人物”，而且在七十年代的全面对策，今后也是这些人出面吧！

### **强有力而且彻底的七〇年代治安对策**

这些警察中的优秀人物予感到七十年代政情不稳，为此作准备，以整備充实机动队为基轴，特别确立了彻底的治安对策。

第一点治安对策表现在一九六九年度的予算中。一九六九年二月八日，在众议院予算委员会上社会党的畑和氏追究说：“听说全国八万警察官准备在七十年代重新装备，其具体装备什么东西应该明确起来”。反对这个意见的荒木国家公安委员长发表如下回答（根据速记录）。

“概括起来，需要警备用车、警备装备品、通信器材、机动队设施的增加人员的费用，加在一起计算来看，大约需八十一亿日元的样子。这同一九六八年比较起来，估计可能增加约二十三亿日元。谈到警备关系，例如把警备用车、通信器材等作为主要的援救灾害、整理拥挤使用的东西是当然要有的，只为公安警备用的不用说都是需要的。大体上警备方面的费用，若总括起来说要八十亿日元，我想是应得到理解的。

在项目方面仅供参考，顺便说一说。购买警备用车和维护费用约十亿日元，警备装备品约六亿日元，机动队设施十

三亿日元，复兴设施补助四千万日元，警备训练等警备活动费三十六亿日元、通讯器材五亿日元、超勤补助八亿日元，增加人员教育经费以及设施附带事务费约二亿六千万日元。以上有这么多项目。”

这些装备相当于全国警察官一半的八万五千人的“武装”，首先作为个人装备购入的盔形帽、硬铝大檐、出动警服等。机动装备也达到多种巨款。例如仅就车辆来说，购入运输车二百八十七台（五亿一千八百万日元）、放水车二十一台（一亿一千万日元）、现场指挥车二十台（四千七百万日元）、物资搬运车十一台（一千五百万日元），其他、警护车、宣传报导车等合计四百一十七台，九亿三千五百万日元。仅就这些车辆维持费，一年就需要八千万日元之多。

以这样膨胀的预算来重新装备的机动队，为了熄灭正在燃烧的斗争的烈火用尽了一切力量，这回可是三头六臂的“活跃”起来了。

一九六九年：

一月，东大安田讲堂解除封锁和神田学生区（18、19日）  
▲决定停止东大入学考试（20日）▲京都大学教职员、学生在本部院内搞逆封锁，防卫全共斗学生的袭击（22日）所谓“京大方式”。从这时开始纠纷之火遍及各地

二月：由大学职员和体育会学生撤去日本大学法律、经济、工科的街垒（2日），▲封锁大阪的两所高等学校毕业典礼的会场（25日）。▲排除京大的本馆封锁实力（26、27日）。▲机动队进入东京教育大学（28日）根据大学的要求解除封锁。警察厅调查的纠纷学校有七十一所。

三月：国立大学入校考试、京大等七所大学由机动队警备（3日）。▲以机动队解除东京外国语大学封锁（1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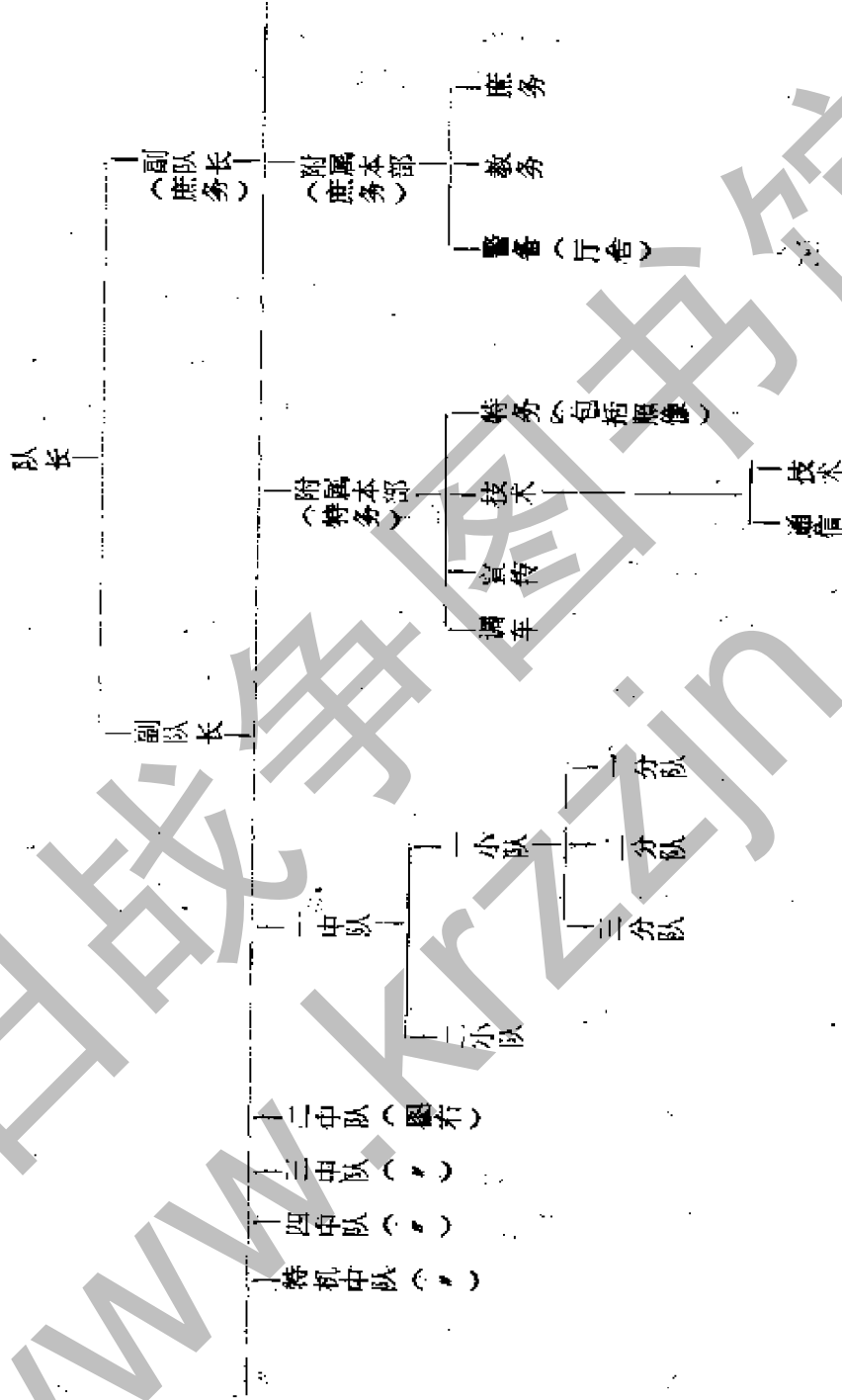


图5 警视厅机动队组织



四月：搜索冈山大学，冈山县警察有本宏巡查（二十六多）因投石致死（12日）。

五月：民族派的“全日本学生宪法会议”、“全国学生自治体联络协会”成立（3、4日）。▲警察厅调查纠纷学校八十五所（22日），反对大学立法的动向活跃起来。▲内阁会议决定大学处理法案、提交国会（24日）。

六月：反对亚太理事会斗争（8—9）。▲六·一五反安保统一集会（15日）。六月末有纠纷学校一百零三所（警察厅调查）。

七月：全国国立公立私立大学校长发表反对大学立法声明（12日）。▲自民党在众议院文教委员会上强行通过大学立法（24日）。▲众议院通过大学法案（29日）。

八月：在参议院文教委员会上强行通过大学法案（2日）。▲参议院通过大学法案，该法案生效，（3日）。▲东大、鹿儿岛大学等表明不实行大学法，纠纷学校一百一十所（警察厅调查），▲施行大学措施法（17日），同一天，纠纷学校六十六所，其中严重者十八所（文部省认定）。▲广岛大学以机动队解除封锁（17—18日），学生在本部由筑城进行抵抗。（措施法生效后的8日，神户大学用机动队，九州大学理学院自主解除游行示威）▲日本大学进行首次总长选举，铃木理事当选（31日），警察厅调查的封锁校五十所，机动队在八月中出动三十六次（一九六八年中三十一次，一九六九年到八月末出动二百四十二次）。

九月：新学期开始（1日）在机动队警备下再上课引关注目。▲机动队进入内部继续有暴力行动的早稻田大学。▲全国全共斗联合会成立（5日），在东京大学全共斗代表山本义隆被逮捕。▲日本大学新理事会成立，古田氏任会长

(10日)。▲纠纷学校六十四所(13日,文部省调查),▲机动队进入了封锁教室的东京都立青山高等学校(14日)。▲在芝浦工大大宫校舍内暴力斗争中埼玉大学学生泷泽纪昭君死亡(18日)。▲创价学会系“新学生同盟”结成准备会(25日)▲在中央大学的内部暴力斗争中,关西派望月上史君死亡(29日)。

十月:文部省制定禁止参加游行示威等高校生的政治活动基准(7日)。▲搜查法政大学,警视厅干部对大学例外的正常化要求(8日)横扫据点战术。▲九大用机动队解除封锁,(14日)。

▲向赤木派出机动队,全面解除封锁(18日)。

据检查重新上课一般化,反代代木系学生被驱逐学园,以赤军派为首开始转向过激行动。高级中学校的纠纷也明显地出现了。

一到一九六九年末,大学里常驻机动队习以为常,早大等校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开始在“机动队监视”下进行上课。当然,抵抗机动队,在“检查站”也拒绝出示学生证,引起纠纷的学生也有,这些学生被机动队员推搡的,乖故被开除了。尽管是这样,以接受机动队监视下上课的早大为首的都由主要大学当局的态度,已经见不到亲手保卫大学自治的气魄了。

### “在戒严令下首相访美”

在一九六九年的予算中,有必要指出“新武器”的出现。其中首被学生街垒用的凿岩机,街垒拆出车,以空中攻击为目的空中作业车、喷水范围高十五米宽六十五米的高压喷水车、高压开枪车、新式瓦斯枪等。由于这样的“武装”,学生方面人身被害的程度也显著的加深了。特别是使

用瓦斯枪的军品中，加进了阻碍细胞增殖机能的物质，警察一方面指责说：“那种东西没有进去”，还仍到处发射瓦斯弹。

尽管是那样，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七日佐藤首相访美之际的警察警备，表明今天的警察的位置和任务法西斯化了。当天在全国各地虽然有十五万人参加了反对首相访美的游行示威，但出动了那样警备的警察实际上是七万五千人。的确的确是警察史上的最大规模的动员，特别是在羽田机场周围，配备二万五千名便服警察，那才是滴水不漏的警备体制，在羽田机场禁止送迎者出入的同时，实行了飞机起落管制。就这样佐藤首相在既无国旗又无红旗，只有警察队不漏空隙的异常保护之下的羽田机场滑道行上，登上了飞向美国的飞机。就在这种扼杀国民呼声中进行了日美冲绳谈判，以可以带核武器进入日本为前提，一九七二年归还冲绳。

另一方面警视厅与此并行的于一九六九年十月不顾美浓部都知事的反对，新设了警视厅副总监。第一代副总监是榎野勇警视厅警务部长。榎野副总监一上任立即以“临时警察调整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发表了七十年代强化警备对策。据此：①最多两万五千名警察按能警备出动的组织全面编成；②把刑事、防范两部变成第二、第三公安部，除担当原来任务外，也担当学生事件等公安事件；③强化警察署长的权限谋求事务的合理化，谋求后方治安万无一失——在这种对策之下，警视厅的治安体制更升一级了。

这样以来，警察的政治、公安警察做什么都没出错了。在一九七〇年度的予算中，为增加五千名警察，“因破坏集团的暴力而保护市民生活”实现了五十一亿日元的予算。如果说反代代木系全学联是破坏集团，那么以警备规定为名，随

着妊娠妇女通过的机动队（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在东京车站）不也是破坏市民生活的暴力集团吗？”

革新阵营在坐食一九六〇年安保斗争的“遗产”期间，警察当局对一九七〇年的对策着着得逞，已经摆好了阵势。川岛氏就任警察厅警备局长，下稻叶氏就任警视厅警备部长也是一九七〇年人事安排的一环。与此同时，一九六九年五月，防卫厅防卫审议官（内局）丸山昂氏转任警察厅警备科长，这个事实说明防卫厅向警察厅接近的现象值得注意。

“今日国家权力被称为最高权力，那就是要高度组织化，即要有机械性强制力，其实力的行使要被合法化。这个国家权力要由根据需要行使的警察力量和军队来加以保证，而且那是合法化的实力。”

成蹊大学的佐藤功教授关于国家权力的最高性是这样叙述的（讲座社会学第五卷《民族与国家》）。

如果他说得对的话，像佐藤内阁这样广泛的充分利用警察权力的政府是没有的。成为佐藤内阁权力的机械强制力的是警察、军队、甚至连检察、情报机构也全部掌握了。掌权者动不动就滥用权力。我们国民在恐惧专权的内阁的同时，必须严密监视执政者滥用权力。

### 3. 国家的暴力机器·

#### 自卫队的实态及其目标

##### 成了青蛙的蝌蚪

掌权者通过内阁调查室、公安调查厅等监视国民的动向，如有抵抗权力机构者立即遭到警察、检察等机构的压迫。可是，尽管这样也不能平定的情况下，作为“王牌”只好打出最强

大最后的国家暴力机构——自卫队。从自卫队的前身警察预备队建立，早已有二十年的历史。国民当中的一部分至今仍然满足于把自卫队当作不承认宪法第九条的私生子对待。可是，即使不把自卫队作私生子对待，现实的自卫队对和平宪法的存在也满不在乎，今天除美中两国之外，自卫队作为太平洋居首位“军队”成长起来了，其枪口说不定何时会对准日本国民的，

自卫队的前身警察预备队是一九五〇年八月诞生的。诞生的动机不用说是因为同年六月发生了朝鲜战争，当时正在占领日本的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元帅，为了添补由于驻日美军移驻朝鲜而出现的日本“真空状态”，送给吉田内阁一封信，令其建立警察预备队。

这时的日本警察力量共有十二万五千人，国家地方警察三万人，自治体警察九万五千人，作为海上警察力量，海上保安厅职员有八千五百人，巡逻艇六十二支，麦克阿瑟的信提出要增加警察预备队七万五千人，海上保安厅要增加定员八千人。

警察预备队的组织分成本部和部队，本部统辖整个预备队，部队由纵队总监直接指挥行动。顺便说一下，这时的部队以东京、北海道、兵库、福冈为中心分为四个管区，以国家地方警察的办法来选考队员，同年之中进入当作兵营的美军帐篷。

队员的住所像是美军的旧居，服装和装备也几乎是美军的处理品。成为装备中心的枪，口径是七点六二毫米的M1式步枪和七点六二毫米骑枪M1。M1式步枪是美军从一九三五年开始使用，距“现代化兵器”很远，更严重的甚至连旧日本陆军使用的九九式七点七毫米步枪也使用了。吉普，汽车

当然也是陈旧的。看戴着大帽子，穿着肥肥大大的衣服预备队员，爬上阶梯很高、处理品的大型卡车看光景的人也很多呀！当时的一般国民对这种自卫队投入蔑视又多少有点怜悯的目光。因为警察预备队员多少有些像旧军队的尾巴，这种预备队中，除了无法糊口者外，是没有参加者的。

可是，就是这个警察预备队，以美苏两阵营的冷战为背景，于一九五二年缔结日美安保条约向保安队“转化”，装备也换上了卡宾枪、重型、轻型机关枪，此外更有一百零五毫米榴弹炮、轻型坦克车等，为了海上警备承担了一千五百吨级的护卫舰十八艘，二百五十吨级的支援登陆艇五十艘。而保安队的装备在总和机动力量方面近乎于零，当时陆上自卫队有这样的感想：“在当时东西方关系紧张的情况下，日本幸亏未遭到苏联的进攻。”

#### 增强杀伤力的武器

从一九五二年保安队建立开始到二年后的一九五四年，保安队长成为今天的自卫队。自卫队的组织是陆、海、空三幕僚监部之下，以“军队方式”编制的部队，同警察预备队，保安队是不同的，当然，变成自卫队以后的装备不断更新，而且引入国产品，以适应日本人的身体和地形。

例如：拿陆上自卫队的普通科连队（过去的步兵）所持的枪头说吧。现在自卫队使用六四式七点六二毫米步枪，这种新的步枪是丰和工业株式会社生产的纯国产品，有效射程为四百米，连续射击能力每分钟五百发，同过去的 M<sub>1</sub> 式步枪每分钟射击三十二发比较起来实在是很厉害的步枪。第一师团（以关东地方为中心）的一个军曹（军士）说：“用六四式步枪一发子弹打中脚，则骨头破碎，被打的人脚则完全不能用了。用过去的枪，根本没有多大关系”。而且一扣扳

机，数十发子弹一齐飞出去，不必要一发必中的技术。因此，刚入伍的“新兵”只要能射击也能打倒“敌人”。

所谓“敌人”是什么？自卫队不是战前那样的统治殖民地的远征军，只是保卫日本的“守备军”。而且，在所谓洲际弹道导弹的诱导武器发达的今天，在不需要考虑外国兵来侵略和开枪的无忧无虑的今天，新步枪的“目标敌”同样是日本人。陆上自卫队在静冈县下的东富士打靶场的国道上进行大规模射击训练。偷看训练的国民谁都一定歪着脑袋想：

“为什么必须搞那么强大的武器呢？”

### 世界上第一流的现代装备

航空自卫队骄傲的是主力战斗机F104J的性能也是国际水平的，总之F104能载重的装备近于自重六千二百五十公斤的一倍，当然能轰炸敌人的基地，从一九六九年开始在全部分F104J都装上与自动防空警戒管制组织有关的机械，追踪不明国籍的飞机、迎击敌机，攻击、直到返航一切都在地面上用电算机操纵。在世界上恐怕只有五、六个国家有这样完整的自动防空警戒管制组织。

以其为目标的第三次防卫力量整备五年计划（一九六七年度——一九七一年度），从该计划最终年度开始在越南战争中活跃一时的F<sub>4</sub>EJ（美国名称为凡托姆）将被引进。F<sub>4</sub>EJ是双引擎、双座、武器装载量大约超群出众。短距离进攻时，三百四十公斤的炸弹能装十八颗，四百五十公斤的炸弹和凝固汽油弹十一颗。自重二十吨，因全付装备重量是二十七吨，能装法国试验爆炸的二点三吨的原子弹也能装三颗。最高速度是音速的二点五倍，续航距离在全付武装的情况下，在半径七百公里的范围内随便飞行。打开地图看半径七百公里的范围，中国的一部分，朝鲜、库页岛等都是其“攻击范

围”。一架飞机价值十九亿八千万日元，到一九七七年引进一百零四架。光从F、EJ来看，航空自卫队的任务明显地超越了“自卫”的领域。

海上自卫队的护卫舰乍一看是比战前的军舰软弱。这是因为没有“大和”“武藏”号那样的巨炮。但是装入护卫舰的对潜导弹的速度最高的，最大射程五英里。具有自动寻找活动目的物的鱼雷，瞄准了目标就不能逃掉。此外，护卫舰还装载有无人驾驶反潜直升飞机（附带鱼雷的直升飞机）、波福斯式高射炮（对潜火箭）、长、短鱼雷等多枚。现代的护卫舰一艘七十亿日元，其中船价占百分之四十，其余百分之六十是对潜对空装备，可见一艘护卫舰重装备的价值。当然这样重装备护卫舰的性能，在太平洋是次于美国的。到一九六九年未开始对射程一百公里的舰对陆地导弹研究。这样以来，不要说是“敌人船队”，就是敌人的基地也一样攻击。此外海上自卫队也在考虑引进核动力潜艇。

在防卫厅的技术研究本部里，激光（杀人光线）、CBR（化学、生物、放射线）等武器的迅速开发也引人注目。陆上自卫队十八万人，海上自卫队十五万吨、航空自卫队一千一百架飞机的阵容，在官兵人数、舰艇只数、飞机架数方面，国民对于“其机动力量远远超过战前的日本军”的事实应有清醒认识的必要。

#### 少年自卫队员的死与教育训练。

陆上自卫队少年工科学校的学生十三人于一九六八年七月初旬的溺死事件，事到如今更表明极为严重的自卫队训练事态。当时，陆上幕僚监部的大岛第五部长（担当教育、陆将）辩解说：“少年工科学校的训练决不是严厉的，只是当时那种场合，田村一等尉官自己独自决定让学生渡河训练造



成那种事件。”这个话是不真实的。原因是听到了少年自卫队员死讯的陆军幕僚监部有的干部断言直率的说：“大战结束后生的青少年虽然听说没有根性，但没有想到那样的不检点”，赞成这种意见的也大有人在。他们当中也有人认为：“问题不在于自卫队的训练，而在于战后生的没有根性的孩子们”。

事实上，自卫队的训练是相当严厉的。在千叶县习志野市有陆上自卫队第一伞兵团，昼夜都有从飞机上搞空投训练，这可以说是进行一种“体罚”，本来是体罚，又说是俯卧撑，在自卫队内被禁止的体罚还在进行，恐怕人们还不知道吧！

不过，把这种体罚如说给伞兵团的干部，他们会说：“那种俯卧撑是队员们为了惩罚自己的过错，‘自主’搞的，我们不知道”。在军队里重视共同生活，若是一个人搞俯卧撑其他人不搞可不行。这就是说，俯卧撑在伞兵团内作为一个罚则成为事实，同旧军队有什么两样呢？

航空幕僚监部的自卫队员说：“若说训练的严厉，现在比战前更厉害”。他还说：“自己队比旧军队更机械化了，使用头脑的训练较多。因此，精神上的疲劳远远超过肉体上的疲劳。肉体疲劳通过睡眠可以恢复，精神上的疲劳，由神经衰弱逐渐向神经分裂升级。在旧军队里肉体的体罚等有轻松的味道，若是被打，打完也就算完事了。可是在自卫队搞的停止晋升、减薪等物质的、精神的体罚，对中年人来说比肉体的体罚还残酷”。

### 皇军思想的产生

自卫队的训练大致可以分为三方面。第一是为维持国内治安的治安出动训练；第二是防卫出动训练；第三是灾害出

动训练。其中的治安出动训练有问题。原因是成为治安出动训练对象的“敌人”是同自卫队员同一血统的日本人。而且，治安出动之际训练的内容有问题。在一九六八年春天的众议院予算员会上提出的陆上自卫队治安行动教育方式中有“一下子打倒暴动主犯”等危险词句。（注）

增田防卫厅长官虽说：“那种教学方式绝对没有”，但在野党方面一拿出证据，就变成了“绝对不承认那种教学方式，不准那样做的”。可是，增田长官不许搞的是治安出动时的“教学方式”，声言应该搞的是事后能代替教学方式的“部队长注意事项”之类的东西。

而且，这种教学方式和注意事项的有无都可以不予理会，却要鼓励第一师团（东京练马）、习志野的第一伞兵

（注）：治安行动教育方式的内容虽然没有公开发表，总页为二百七十八页的厚厚一本，内容分为四大章。第一章是“出动队员注意事项”；第二章是“法律根据”；第三章“对国民正当的宣传报导”；第四章是具体的“行动”。对于有妨害的游行示威队伍，当警察取缔无效的时候，①自卫队发出警告；②由全副武装的自卫队员进行游行示威，其次是以放水、放烟幕、检查、运送等援护警察；③连续在国会和首相官邸等政治中枢等地进行警备；④用这些手段仍不能平息时，即出动镇压。在现场使用武器的最高指挥官，通常委托给一等校官来判断。不得已的时候由中队长（一等尉官）或小队长（三等尉官）来决定。如果说是三等尉官也只能是防卫大学出身的队员。关于实弹的使用，首先是在目标的身旁为了威吓而放烟幕，即使这样也不能平息时，为达到“使其行动思想疏远的目的”“以暴动主犯四肢为目标。一枪打倒”。

团，昼夜进行紧张地的出动训练。

从这种平日训练的总成果和以一九七〇年安保为目标的予备演习，于一九六九年十月三日，在东富士演习场（静冈县）进行的第一师团第一特科连队（砲兵）的治安出动训练。陆上自卫队在这一天第一次向记者公开了掩人耳目的治安训练，让人亲眼看到特科连队的二百人是怎样镇压扮演示威游行队员的三百人，挥午警棒，对付乱入用木箱和绳子圈定市街的“暴徒”，首先是出动中型直升飞机停在上空。然后从直升飞机上顺着绳索下来的“敢死队员”向地上扫荡，然后是更大型的直升飞机着陆，出马进行真正的镇压。一方面与此同时，开始在地上喷水龙和发射吹泪弹M<sub>41</sub>型坦克车轰隆的同时，粉碎了街垒，游行队伍方面用火焰瓶攻击坦克车，甚至动员出动了压道机，只用了三十分钟就“镇压”了骚动。

若是能渡过一九七〇年日美安保条约再修改讨论期，任何时候向对方提出要求，都可以在一年内废除安保条约，假如这样，革新阵营若进行要求年内废除安保条约的游行示威，有时学生集团动起来，首都的混乱也值得考虑。这时，第一师中的练马第一连队和市谷第三十二连队，随后朝霞的三十四连队，相马原的第十二师团出动，习志野的第一伞兵团从空中“飞来”比较方便。

根据这种情况陆上自卫队治安装备的充实也很急迫。在一九六八年、一九六九年度准备催泪瓦斯九千公斤、盾牌一万五千个、钢盔十八万一千个，木枪一万八千三百支。一九七〇年度中带防石面具的钢盔一万个，催泪液五吨，此外决定购买钢琴线、铁条网、木材等。在治安出动之际除使用M<sub>41</sub>型坦克车V107型直升飞机、步枪等装备之外，也使用着色剂、从空投

下消火弹、钢叉、长柄镰刀、放恶臭气的放水器等。还在一九六九年度决定，十年内陆上自卫队员增加六千人，至今在七十年代准备的措施那就不用说了。自卫队按满员率计算稍微超过百分之九十，在防卫厅增加六千人的决定中，不能满员是可以想像的。这种情况下的自卫队对付外国敌人虽然不充分的，而对付游行队伍，从装备和训练来看还是相当充分的。

与治安训练并举的是自卫队的精神教育也是不能忽略的。防卫厅干部经常挂在咀上说：“自卫队为了行使宪法承认的自卫权，在自卫队法明确规定的范围内行动”。果真如此的话，自卫队的精神教育核心就应该置于新宪法之内。可是，现实的自卫队肆无忌惮地扩大是根据战前的大日本帝国宪法。

在陆上自卫队富士学校里，有不给外人看的称之为教育参考馆的临时营房性建筑物。向这里跨进一步的人，自己觉得好像被时代机器送回到二十几年前日本的错觉。

那是自然而然的。首先，在入口脱帽之后，先看到的是东乡元帅在日本海大海战的画卷，在出口处让人看到的是在“大东亚战争”（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太平洋战争）中跃武扬威的东条大将的英姿（？）这些在新宪法里是哪儿也找不到的字句。

有的是对大日本帝国宪法的怀念，对大日本帝国军队的歌颂。像这样的参考馆用于对现实军队的精神教育是有问题的。与此同样的参考馆和教育馆，分散在习志野的伞兵团，江田岛的干部学校等处都有。

### **可怕的防卫大学出身者政变**

自卫队在各处建立教育参考馆表功馆，致力于自卫队精神一体化，就是让现实的自卫队员的防卫精神个个都呱呱叫

的意思，那是当然的。现在将军，将军补一级的最高干部，深深打进了旧军队的皇军思想，第二次大战中也作为中坚指挥官参加了战争，但最近高级中学毕业入伍的自卫队员，战后终究是战后，是自卫队创设以后出生的。事实上，防卫大学出身的青年干部批判富士学校教育参考馆的内容说：“那是相当落伍的东西”。

在自卫队内有几个思想方法不同的集团相对立。一个是像前面叙述过的自卫队最高干部同将来领导自卫队的出身者在思想上不一致；第二个是防卫大学出身者同一般大学出身者的对立；第三个是最高干部内部的对立。最高干部的对立是战前陆海军的对立，也反映到自卫队内部来了。例如，关于日本的防卫，海上自卫队的干部说：“现在的陆上自卫队的规模太大了。把主要以防止外敌侵略的海上自卫队缩小了，陆上自卫队不出来干涉内政吗？”而陆上自卫队的干部反击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难看的败退是海军无能的表现，若信用海上自卫队来保卫日本那是靠不住的”。

像这样陆海军的对立，围绕航空自卫队、统合幕僚会议干部的人事任免逐年表面激烈化。不过也可以这样说吧：“这种很像旧军队时代对立的延长，在哪个社会都有，若从国民方面来看，这算不了什么问题”。

可怕的是防卫大学出身的干部的动向。大江健三郎说“防卫大学生是同代的耻辱”防卫大学一期生（一九五八年毕业）于一九六八年七月进升为三等校官，如说三等校官，那是陆上自卫队的大队长一级干部，海上自卫舰水雷长等重要的战争指挥官。他们多数家贫，因不能进一般大学，而进入了防卫大学的人，对于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憎恶的心情也比其他人高一倍。

因此，防卫大学出身的干部比旧军队的团结精神更加强烈。因此，这样防卫大学出身者若以整顿政治和安定民心为名发动政变，那就有可能把日本的民主政治搞成完全瘫痪状态。而且，防卫大学出身者，确信只有自己是最受民主教育的人恐怕他们有可能轻率地判断认为，防卫大学出身的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可理解的都是允许的。有关当事人对于防卫大学出身干部的动向不予以充分注意，可能造成无法挽救的局面。不过，在自卫队干部当中还有别的苦恼。在一部分自卫队队员中，有对自卫队应有状态抱有怀疑的“造反队员”。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航空自卫队第四十六警戒群的三等空军军曹小西诚（20岁）在队内张贴反战传单的事实表明有造反的。这件事给自卫队干部以很大的冲击。防卫厅当局说：“小西以个人的行动散发了一〇·二一反战传单，是因为拒绝训练，与外界没有关系”以此解释了事，但“造反队员”在自卫队员和警察当中不断增加也是事实。

一九六九年陆上自卫队以年轻的军中曹士为对象实行了思想调查，“反对建国纪念日”者军曹占百分之零点六，军士占百分之三点一，认为“太阳旗是战争旗”者军曹占百分之零点一，军士占百分之二点六，这与前面造反队员的出现和这种军内曹士的思想之间有密切联系。正因为如此防卫厅对小西军曹立即给以免职处分的惩罚，自卫队员作为一个国民像一〇·二一那样散发反战传单不应允许吗？因为一〇·二一国际反战是反对美国违反日内瓦协定，轰炸北越扩大越南战争。另一方面由自民党决定的建国纪念日的庆贺节日法案是强行通过的，自卫队员知道了这一情况，主张反对建国纪念日，也是出自于国民的常识，也许决不能因此说是自卫队员“造反”。

## 干部自卫官中旧军事学校和防卫大学出身者比较

1968年10月31日当时

军种	校别	
	防卫大学	旧军事学校
陆上自卫队	2500	1700
海上自卫队	900	900
航空自卫队	1100	1000
计	4500 (14%)	3600 (11%)

注：所谓的军官学校出身者是指陆军士官学校、航空士官学校、航空管理学校、海军兵学校、海军机关学校、海军管理学校出身者。防卫大学出身者是指一期（1958年3月毕业）—10期（1967年3月毕业），干部自卫官三等尉官以上者。

### 文官优越是画饼充饥

总之对国民来说还有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就是现在的自卫队里文官控制大部分是不彻底的。防卫厅设置法第十八条说：“长官官房以及各局设置书记官、部员及其他需要的职员”，这些内局的重要职员是文官，所谓“不把军官们委派去当参事官和书记官”这是政府说明的文官优先的法律根据。可是现实的防卫厅内局里，凡是不称为局长、科长的，在防卫厅来说确实是重要的职位均由军官集团的人占据，文职官员若没有军官们的合作，在国会上一个答弁也不可能。

在统合幕僚会议、各部队的文官控制，几乎等于不存在的。

社会党的冈田春夫氏（前众议院议员）于一九六五年二月在国会上揭发统合幕僚会议的《一九六三年度防卫图上演习》（所谓“三矢研究”）给予国民以极大的冲击，记得这件事的人很多吧！这个研究，是在朝鲜半岛上北朝鲜军队突破三八线进攻南朝鲜，日本国内形势恶化了的设想之下搞出

来的防卫研究，特别是忽视文官控制的非常事态措施，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

对于三矢研究的实态感到惊奇的防卫厅内局含糊其辞的答辩说：①看看国会与自卫队、政府与自卫队，防卫厅内局与各幕僚监部之间的关系，对于文官管制没有不安感觉；②三矢研究仅是研究训练，不能称为计划性质的东西；③引入该武器要等待政治上的判断。可是，因为防卫厅的文官不知道，连进行这样重要研究的本身都不知道，充分证明文官控制是有名无实的东西。

航空自卫队也是这样，同美军之间秘密签定了松前（当时的空军将官）·班斯（当时驻日美军第五空军司令官）协定是明确的。该协定是一九五九年九月缔结的，到了一九六七年国会才开始知道这个协定的存在。根据这个协定规定，

“日本的防空遇到危险的情况下，单方面的进行了处置之后，可以进行调整”，根据美国空军的单方面处置，包含着日本有卷入战争的危险。

可是，像这种自卫队指挥官们的独断专横极为明显的时候，自卫队的干部表示了什么样的反应呢？他们首先把秘密研究、协定的存在视为当然的同时，极为憎恨的是揭发这件事情的冈田氏和社会党，有个陆上幕僚监部的干部一口肯定的说：“搞三矢研究为什么不好？揭发这件事情的人不是损害“国党”的恶党又是什么吗？”

指挥官中有的人还说：“那个三矢研究为什么不能正面答辩呢？”对内局组的“无能”表示了极大的愤怒。的确，关于三矢研究，松前·班斯协定问题，防卫厅长官、局长、科长等的答辩是支离破碎的，引起了其他省官僚的笑话。内局的“软弱”是个大问题。试想，内局都是警察、大藏、通



产、厚生、外务等省厅聚集来的，在防卫厅工作一、二年再回到“本省”的一些暂栖身者很多，他们是不能控制军官集团。内局专门处理防卫问题，配备“品质好”的官僚，确保文官控制是必要的，可是，优秀官僚却难以接近也是个现实的问题。

### 与政界、产业界勾结的军队

现实的自卫队干部，服从内局集团的指挥，可是他们却抛开内局组，与政治家和产业界勾结起来。

一九六八年的三月，防卫厅围绕第三次防卫力量整備计划泄漏机密事件引起轩然大波。事件的概要是伊藤忠商事公司通过航空幕僚监部的一等校官，获得三次防的机密资料。事件虽然只是这样，其内幕情况，国民是不可估计的，同产业界、同防卫厅军官集团、同政治家有很深的联系。

我国的防卫产业，由于一九五〇年的朝鲜战争中清醒过来。在比邻的朝鲜半岛突然暴发了朝鲜战争，日本作为补给基地提高了重要性，美军以国外筹集的形式由日本供给汽车、货车、船舶等运输机械材料和燃料油罐等金属制品，还有医药品、被服等后方支援物资。

可是，随着朝鲜战争的激化，一九五二年驻日美军司令部发出了在解除从前禁止武器制造的指令、许可我国产业界制造武器的同时，解除民间军需工厂的指定赔偿，实施了飞机制造设施八百五十个工厂返还给日本等。这样，往年“垂死的商人”们又活跃起来了。

再次复活了的防卫产业，为了积极的寻找活下去的粮食，通过经团联防卫生产委员会，开始向日本政府（自民党政政府）施加压力。因为朝鲜战争于一九五二年七月完全结束以后，防卫产业除了日本再扩张军备维持生存以外别无办

### 三次防的主要装备和整备计划

	品名	数量	需经费 (亿日元)	合同公司 (括弧内是技术协作公司)
陆 上 自 卫 队	坦克	280辆	220	三菱重工、日本制钢所
	装甲车	180辆	40	三菱重工、小松制作所
	35毫米高射机关炮	30套	110	日本制钢厂(瑞士·埃利坤公司) 三菱电机(瑞士·坤都拉贝斯公司)
	大中型直升飞机 地对空导弹(準式)	83架 3群	220 530	川崎飞机(波音公司) 富士重工(拜尔公司) 三菱电机、东芝莱塞奥公司
海 上 自 卫 队	护卫舰	14只	110	未签合同
	潜水艇	6只	300	未签合同
	其他舰艇	41只	220	未签合同
	对潜侦察机	60架	970	PZ1—川崎飞机 Pxs—新明和工业
	对潜直升飞机	33架	180	Hss2—三菱重工(西克尔斯基公司)
	其他飞机	20架	70	B65—伊藤忠商事从彼奇·克拉夫特公司输入
航 空 自 卫 队	地对空导弹(奈克)	3群	360	三菱重工(麦克唐纳·道格拉斯)
	运输机	10架	100	ys11—日本飞机制造
	救灾用飞机	26架	90	V107—川崎飞机(波音公司) MU <sub>2</sub> —三菱重工
研 究 开 发 当 局	次期教练机(Tx)	试作4架	54	三菱重工、富士重工、川崎飞机 日本飞机
	次期运输机(Cx)	试作4架	84	日本飞机制造
	次期战斗机(Fx)	104架	2000	(三菱重工·麦克唐纳·道格拉斯) 川崎飞机

法。经团联防卫生产委员会把巨额政治献金作为推动保守党

内阁的杠杆，使其制定了所谓一次防（一九五八年——一九六〇年），二次防（一九六一年——一九六六年），三次防（一九六七年——一九七一年）的长期防卫计划。

特别是进入一九六九年，财界对防卫问题发言更积极了。其中有经团联会长植村为加强防卫力量的演说（五月），武器工业会的加强防卫产业案（五月），在轻井泽的企业高级人员讲习会的防卫讨论（七月，生产性本部，八月，日经联），日本商工会议所会长永野的安保发言（九月）等，同年十月，日经联常任代表理事樱田武好像概括上述这些发言而提倡修改宪法。他说：“有良心（？）的日本国民，为了民主的国会运营和强化自主防卫，要求修改宪法”。这样下去的话，到七十年代中期，财界提出核武装方案，财界带头搞核开发、核武装等从正面讨论是当然可以予料的。

一方面，在经团联防卫生产委员会保护伞之下有武器制造厂、商业公司，同防卫厅军官集团的人积极勾结，为自己的公司增加接受订货而狂奔。原因是购买这些武器的规格、时间、价格的权限应该说由使用者的防卫厅军官集团干部掌握。当然，武器制造厂、商业公司不能凭白无顾的取得军官们的欢心，他们以保障军官们退职以后的生活为条件，接受军官们提供的情报，使自己公司较其他公司处于有利的地位。

这样，永盛义夫（航空幕僚监部技术部长——→日本航空电子公司常务）、浦茂（航空幕僚长——→丸红饭田公司计划室长）、和田盛哉（陆将——→伊藤忠顾问）、藤原一郎（陆将——→日本航空电子公司顾问）、藤原岩市（陆将——→日本钢管顾问）等都顺利以下凡到民间公司，下凡的军官们有时由于“指挥”防卫厅的军官集团，因此，产业界和防卫厅之

间勾结，不管愿不愿意都是必然的。政界、防卫产业、防卫厅三者之间通过政治献金、就职斡旋、提供情报、政治工作等，牢牢地结合在一起。政、产、军共同为增进自己的利益，不为国民的防卫是自不待言的。

### “翼会”会员下凡场所

姓名	退职日期	退职时职务	公司名称	职务
秋山纹次郎	1961. 7. 25	干部学校校长	富士重工	顾问
有沼源一郎	1965. 11. 16	补给统制处长	日产汽车	常助嘱托
饭冢洋	1965. 3. 1	术科教育本部长	日本航空电子工业	董事
浦茂	1966. 4. 30	航空幕僚长	丸红饭田	技术计划室长
大谷三雄	1963. 2. 1	补给统制处长	日本飞机制造	董事
佐藤胜雄	1963. 3. 31	干部学校校长		监查干部
木原武正	1960. 5. 22	航空幕僚监部装备部副部长	日本航空工业会	常务理事
岛田航一	1963. 8. 1	航空纵队司令官	日立制作所	顾问
铃木颯二郎	1964. 12. 1	第五术科学校校长	三菱重工	"
瀬户山八郎	1964. 7. 6	干部学校校长	日本电气	"
永盛义夫	1964. 11. 1	技术研究本部开发官	日本航空电子公司	常务
松田武	1964. 4. 17	航空幕僚长	宇统兴产	"
水町胜城	1962. 12. 31	北部航空方面队司令官	东芝电子系统	"
赖富美夫	1965. 10. 1	筹措实行本部长	住友精密	东京事务所长
小福田租	1967. 2. 31	航空幕僚监部付属	日本无线	顾问
牧野滋次	1967. 7. 31	"	东西燃料	嘱托

(注)：“翼会”是以航空自卫队原来干部组成的非正式亲睦团体。1968年的秘密事件后，据说好像这个名簿不见了。

### 保卫谁的自卫队

二十五万人的自卫队以谁为敌人，保卫谁呢？

先看陆上自卫队的目的。陆上自卫队与战时的军队不一样，是自卫军却不是远征军。因此，他们拿的枪炮应该是面对来侵略的军队，东京周围的自卫队全力以赴进行训练。仿佛他们的“敌人”是日本国民当中“破坏和平的分子”似

的。

一九六八年六月上旬，在日本海进行的惯例的美国海军和海上自卫队的联合演习，其规模第一次向日本记者团公开。一看这个演习，正在演习的实际上是美国海军，说自卫队的干部是参观者更相称。海上自卫队的装备是优秀的，而在使用方面是依靠美国的。这样以来，在海上警备行动的主动权就被美国海军掌握了，日本的海上防卫体制不得不从属于美国的防卫体制。海上自卫队是为了保卫美国和美国海军而存在，本来颠倒也是不得已的。

日本的上空以航空自卫队为主加以保护，敌对国的轰炸由驻东京、府中的本国第五空军来承担。这样以来，不受日本国宪法约束的美国第五空军对敌对国家轰炸有使日本卷入战争的可能“那么，日本的上空最终也得由美军来保护，甘愿承担无数危险”（航空幕僚监部二等校官的话）等说了不负责的不该说的话。

日本上空的保卫从一九六九年四月开始使用的地面防空警戒系统才得到了巩固。地面防空警戒系统是对入侵领空的敌机，以分布在全国二十四处雷达站加以捕捉，根据电子计算机的指示，令F104战斗机起飞迎击，发射地对空导弹奈克。

可是，在这些地点中起最重要作用的是千叶县的岑冈基地的机械，却是经常出故障。假如，因为机械故障误认为是敌机而被击落的情况下，用“机械故障”能说服对方国家吗？在那以前，对方国家也许会布告宣战。总而言之防卫厅想要按予定的防空警戒管制系统没有故障的情况下运转。即使那样，地面防空警戒系统在敌机的“高度烟幕”的情况下也是没有效果的。

现在各国的战斗机，轰炸机都装有ECM（干扰电子装

置)，因此，雷达害怕要遭受到迷眼睛的干扰。诚然，地面防空警戒管制系统也附设有反干扰ECCM来对抗ECM。可是敌机若装有ECCCM来袭击的话，地面防空警戒管制系统完全不起作用了。那时，防卫厅内也有“应该装备ECCCM”（航空幕僚监部某三等校官）之类的说法，那样的话，日本的防卫费用将无限制的增长，勿宁说日本防卫体制的扩充将刺激中苏两国，由于这种错误的打算，很有可能带来了增加国际纠纷的恶果。

一九七二年预定返还冲绳之前，关于对于预备自卫官的大量增员、防空以及海上警备力量的增大，有关引进原子潜水艇以及轻型轰炸机装备等的认真讨论就令人不安。

防卫体制的扩充不但对国民生活增加了负担，即便是挖苦的说也是不能忘记由于日本的安全引起不安全的事实。

#### 对自卫队持批判态度

作为朝鲜战争的私生子而诞生的自卫队已成长为有陆上自卫队员十八万人、舰艇十五万吨、飞机一千一百架的实力部队，而且，这样的自卫队不顾宪法第九条的规定，得到产业界的支援，作为自民党组织的重要后盾，不断获得“社会权力”。原航空幕僚长于一九六八年七月的参议院选举中，趾高气扬地作为自民党候选人能够再次当选，正是今天自卫队地位的象征，佐藤首相把佐藤派的三代防卫厅长官（上林山、增田，有田）送进防卫厅，这个事实表明首相是如何重视自卫队的。

事实还不止于这些。在自民党内由于制定了机密保护法，而隐蔽了自卫队的本来面貌，另一方面要实现把防卫厅升格为国防者，达到在事实上扩张军备的动向是很活跃的。自卫队在自民党政府中地位不断上升，尽管市民忽视自卫队

但自卫队却很注意市民。自卫队以及自民党政府，经常要用实力来束缚市民的行动，果真如此的话，市民必须监视这个自卫队和支持它的自民党政府，对他们必须投以批判的目光。应该有监视的义务。

虽说是监视，也要忍耐着看情况，否则的话，光凭感情进行反抗也是不行的。当前对市民中应有两项要求。第一是，为防止宪法第九条空洞化，市民们对自卫队的危险性要有充分的认识，作为宪法的维护者，应该提出有关国家防卫的积极地对策。

第二是从市民方面来说强化日本的安全保障。本来，一个国家的安全保障，应由政治、经济、社会的安全加以确保，不能只依靠军队。莫如说，军备的处理方法不行，弄不好的话，很可能成为维持一个国家安全的障碍。为了减少外国势力的威胁，保持日本的安全，特别要推进政治的，经济的，以及外交的，文化的安全保障政策是至关重要的。为此，同“假想敌国”的中、苏两国加强民间一级的交往，使其同日本结成互相信任的关系是必要的。保卫宪法的市民们。要通过日常活动必须使自民党政府改变对中、苏，特别是对中国的敌视政策。自民党政府假如改变了对中国的敌视政策，自卫队则相对的空洞化了，那只能对日本起到增进安全的作用。